



再忆征战生涯

王若坤

再忆征战生涯

王宏坤

人民出版社

再忆征战生涯

ZAI YI ZHENGZHAN SHENGYA

王宏坤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0,000 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ISBN 7-01-001458-2/K·348 定价 5.60 元

序

这是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

众所周知，这两场战争都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由于胜利，可能使今天的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来之轻易的感觉，事实上这两场战争都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我们十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因而斗争特别激烈、艰难、残酷。我军之所以取得了胜利，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毛泽东主席在指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指挥，没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要取得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

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我们才取得了祖国建设和发展的资格。如果没有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没有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中华民族是争不来这个资格的。然而，今天的胜利和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我作为一个老兵深切坚信：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景必然会光辉灿烂，中华民族定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宏坤

1992年9月

FP20/3216



王 宏 坤

目 录

序	1
---------	---

第一章 在陕甘宁	1
----------------	---

红军改编	1
留守陇东	2
向毛主席汇报	5
在延安学习	8
奔赴抗日前线	12

第二章 冀南平原燃起了抗日烽火	17
-----------------------	----

初到冀南平原	17
组建冀南军区	19
反“扫荡”中	22
建立和发展壮大地方游击武装	26
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32
讨伐石友三顽军之战	35

第三章 逐渐步入斗争紧张时期	42
----------------------	----

合并与整编	42
开展交通线上的斗争	47
参加百团大战和太行山反“扫荡”	51
向敌后薄弱处伸进	60
继续开展交通破击战	66
冀南出现严重危机	70

第四章 艰苦的1942年	77
冀南遭到敌人的加紧进攻	77
“4·26”遇险	81
“4·29”反敌合围	86
精简整编 加强游击战争	89
敌进我进 打开局面	94
营救刘志坚	98
第五章 曙光就在前面	103
冀南抗战形势在好转中	103
冀南抗灾图	107
太行山整风	110
练兵会议	117
第六章 从攻势作战到全面反攻	123
发起攻势作战 展开局部反攻	123
南乐战役	126
成立冀南指挥部	130
成(安)临(漳)安(阳)战役	135
展开全面大反攻	138
临(清)夏(津)恩(县)战役	145
攻取邢、邯、磁 控占平汉路	151
永远耐人回味的冀南战事	162
第七章 解放战争之初	168
邯郸战役	168
组建第六纵队	182
在和平时日	187
参与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工作	195
第八章 挺进中原	205
组建第十纵队	205
南下大别山	211

西越平汉路 进军桐柏区	220
第九章 创建桐柏解放区	232
神速分兵 全面展开 积极歼敌	232
邓县战役	240
贯彻新区政策 安定巩固后方	249
痛击敌人的反扑和“进剿”	255
第十章 中原鏖战急	262
宛西战役	262
宛东战役	272
襄樊战役	277
调动牵制敌人 配合淮海决战	294
第十一章 将战线向南推进	304
扫除桐柏境内之敌	304
桐柏我军的作战特点	310
进入江汉	318
第十二章 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329
组建湖北省委、湖北军区	329
配合主力作战 重点进剿股匪	336
鄂西战役	344
离开湖北之前	351
后 记	356

第一章

在陕甘宁

红军改编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并吞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接着又郑重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了实行党中央关于红军开赴前线抗日的主张，我们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奉命由甘肃镇原地区开赴陕西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集结，进行改编，待命出征。

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原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及其他武装起义。它从游击队几十人搞起，在长达十年的艰苦斗争中，发展壮大，鼎盛时期红军发展到上十万人，先后开辟创建了鄂豫皖、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围剿”和围攻。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前后共歼敌30余万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培养和准备了大批干部。

根据当时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三个师，其中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编成。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不久改为政治委员）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师军政委员会，以张浩、刘伯承、徐向前、王宏坤、陈赓五人为委员，张浩为书记。

第一二九师下辖第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分别以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编成，红四军军部改编为三八五旅旅部，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方强，副主任谢扶民，下辖第七六九团和第七七〇团。因国民党给的编制很紧，红四军两个师只能编成两个大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其中，七六九团以原红十师编成，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政训处主任丁先国，全团2900余人。七七〇团以原红十二师编成，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参谋长袁渊，政训处主任肖元礼，全团2600余人。全旅共计6400余人。红三十一军也是两个师，改编成三八六旅两个大团。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全旅7000余人。

红军改编是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重大标致之一。虽然有一部分同志感到突然，但是大家毕竟明白，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摆在面前，同时又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指引，因而从思想到行动上很快完成了这个转变，戴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臂章。全体将士热血沸腾，准备为挽救民族危亡，抗战到底。

留 守 陇 东

三原改编后不久，中央军委来了命令，一二九师大部开赴抗日

前线，并决定三八五旅分作两半，其中七六九团随师部上前线，另由旅部率七七〇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结合当地地方武装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南面安全。三八五旅前身的红四军自成立后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分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几天后，一二九师主力向东向敌后开进，我们也向西开赴陇东地区。

我们留守的陇东地区，包括庆阳、环县、曲子、华池、驿马、镇原、正宁、宁县和旬邑等地。其中镇原城在我们来之前被国民党军抢占去了。我们旅部及直属队住庆阳城内。张才千的七七〇团驻驿马关等地。环县、曲子等地驻警二团，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归我们指挥。不久又成立了1000余人的独立团，也在这一带活动。

根据中央指示，组成陇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军政委员会成员为：王宏坤、袁国平、王维舟、耿飚、方强等，以我为书记，袁国平同志为副书记。袁国平当时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和我们配合工作，实际上地方的事他管的多。几个月后，他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离开了陇东。后来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牺牲了。几个月的交往中，我感觉他是个很不错的同志，工作很积极，也是很有能力的。为了加强地方工作，我们来后即从部队里抽出了一批干部到各个县帮助工作。

陇东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由于它处于我们与国民党交界处，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同时军事上又处于战略要地，所以任务并不轻松。在我们西、南面不远驻着蒋介石嫡系胡宗南13个军20余万人，这么大的兵力不上前线抗日，却留在这里，其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一有机会，就来搞我们。我们天天得和国民党打交道，实际上也是斗争前线，只不过斗争对象和斗争方式不一样。我们和对面的国民党军队是老对手，我们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我们，这一来使斗争就更具有复杂性。

国民党在陇东也有一个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其机关驻西峰镇。另外各县也有政府和数百人的保安队。并且，在我们的防区内都驻有他们县党部、县政府和保安队等。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府，我们也组织了抗日民主政府。在交界处，实际上是两种政府、两种制度并存。

我们在加强部队训练、警戒的同时，积极开展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相互之间接触不少。记得段德彰同志当时是中共陇东地委干事，他就作为我们的联络员长住国民党驻地西峰镇。

我们也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做群众工作上。一方面开展热烈的抗日宣传，宣传前方作战的胜利，宣传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等等。另一方面发动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商业者救国会，等等。当地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十分踊跃，小伙子一天到晚缠着你，非当八路不可。但是那时扩军有严格的规定限制，首先最要紧的是财力不足，供养不了很多兵，多一个人就得多一笔经费。没有办法，只能在那些青年中反复挑选，最后挑了1400多人，临时组建了一个新兵团，并进行了训练。

经费困难始终是缠绕我们的大问题。数千人的吃饭、穿衣可不是简单事。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过去红军打土豪筹款子的一套办法不能搞了，靠国民政府发饷，远远不够用。陇东和陕甘宁边区人口少，很贫穷，老百姓本身生活就有困难。有些地主豪绅大户有粮也有钱，但他不拿出来，甚至你拿钱买粮，他也不卖，你也没有办法。旅供给处长是有名的老后勤，经验丰富，也急得不行，经常找我想办法。吴先恩同志过去长期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搞后勤，办法点子多得很，现在在旅部供给处当军需员，长驻面安搞采购，做起服装什么的也是省了又省。我们也想了些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一次，我们发请帖，请当地社会名流和豪绅地主吃

饭。席间，我们谈了我们的困难，获得了大家同情，但也有少数地主豪绅不以为然。我们说：“你们要吃饭，我们要抗日，也要吃饭，你们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喝西北风？要不然，我们把部队开到你家吃饭去？”最后还不错，在大多数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下，他们同意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优惠卖粮食给我们。

在陇东期间，国民党和我们的小纠纷不断。盐池、定边那一带产盐巴，一些盐商盐贩成群结队地去驮去拉，到三原、西安等地销售。他们原来从国民党占领区域经过，但国民党区域截收税，层层盘剥。商人小贩受不了，宁愿从我们区域翻山越岭绕道走。我们为了给商人和小贩提供方便，便为其指出了一条道路，这样一来，国民党收不上税，找着借口向我们制造纠纷。

实际上，我们驻下不久，国民党就准备制造摩擦了，只不过当时还不叫“摩擦”这个词，并且双方也不愿意把矛盾公开化。国民党搞了很多小动作，派出特务四处活动，在老百姓中造谣煽动，制造事端，还暗杀我交通员。我们对此也是有警惕性的，一面公开揭露，一面给他们以回击。我和袁国平几次与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钟竟成谈判。谈判桌上我们有理有据，钟竟成理屈词穷，不得不有所收敛。

我们发现，国民党是想挤走我们。我们旅部驻庆阳城，国民党县政府也在城内。他们的保安队守城站岗，我们通讯员送信都不让进出，我们针锋相对，后来也派出岗哨，城楼上他一个，我也一个。他们不放我们的人进出，我们也以牙还牙，也不放他们的人进出。到最后他们觉得在庆阳城内不方便，自动搬走了。

向毛主席汇报

我们留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任务既重大又艰

巨。这里各种问题多，关系复杂，同时统一战线工作政策性强，斗争策略要求高。当然大的方针政策中央已经有了，但一些具体问题只能靠自己摸索着解决，有些关系究竟怎么处理，有些搞法也不知对不对，没有十分的把握。同时，我军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之初，因为多种原因，部队上下也有一些思想情况和问题，此外也还有一些具体困难，都需要向毛主席汇报，请求指示。

我早就有见毛主席的愿望，但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准备专程去一趟延安。

到延安后，我要通了主席处电话，很快得到答复，主席约定第二天下午在办公室接见我。

主席办公处位于延安城内西南面的窑洞里。第二天下午，我按时来到。主席正伏案写作，见我来了，站起来伸过手来热情地和我握手，“哦，你就是王宏坤同志？”想到主席很忙，我准备简简单单地作个汇报，但主席要我讲详细一些。

我汇报说，我们进驻陇东以后，部队除了加强训练、加强警戒外，还大规模开展了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活动。这里过去就有地下党，红军时期我们也两次驻过这里，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好，群众欢迎我们，军民热情很高，抗日工作很活跃，组织起了许多抗日群众组织，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有我们自己组织的，也有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

说到这里，主席打断我的话追问：怎么个合作组织法？我说，和国民党先订好协议，讲好规矩，主持人由双方选派，活动工作统一安排。主席点点头。

我说统一战线工作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有团结也有斗争。有时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国民党中有些人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我向主席说了国民党在庆阳城里制造纠纷，后来其县政府自己又搬出城的情况。

主席很认真地听着，有时还边听边拿起桌子上的小纸条，提笔写上几个字或一句二句话后又放到抽屉里，但就是很少直接表态。

毛主席很关心部队生活，问我们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粮食问题怎么样？我说，当地缺粮，而且国民党封锁我们，少数豪绅地主也故意不卖粮食给我们，还抬高粮价，部队粮食没有供应，吃粮很困难，只能想些临时办法，还说了我们发请帖请民主人士和豪绅地主吃饭商议买粮的事。

主席听后点点头。

主席又问部队目前思想状况。我回答说，开始整编时，大家思想稳定，但是时间一长，由于部队干部多、老兵多，又处于后方，部队没有发展，许多干部是副职，有的连，副连长好几个，大家窝在一起，有点情绪。我向主席提出：“我想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学习。”

主席很高兴：“好哇，你送多少？”

我说：“送 500，分作两批。”

主席同意了。

我又请示说：“有 1400 多名新兵，目前在新兵团，不知怎么安排好？”

主席当即指示说：“你们留 600 人，其余送靖边独立团。”

还有两个具体问题，我想报告主席，请主席批准。一是因为我们招了 1000 多新兵，超支了 200 块钱，希望主席批准报销一下。200 块钱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为这事，我曾分别向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和中央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报告过。肖劲光说，这可不简单，不好办。叶季壮说，数目太大，我作不了主，得找主席亲自批准。我对主席说：“主席，因为招了这千多名新兵，超支了 200 块钱，能不能请您批准报销一下？”主席回答说，“可以嘛。”并当即给叶季壮写了一张字条，亲自批准报销。真没想

到主席这样果断痛快地给解决了。

停了一会儿，我终于忍不住对主席开口说：“主席，我也想学习。”主席望着我微笑着说：“你也想学习？”我说，“主席，我从小没有进过学堂门，我还不识字呀。”主席亲切地说：“那好吧，延安有‘红大’，‘抗大’，还有其它学校。你来吧，把你那边的工作安排好。”主席同意了，我很高兴，也很感激，连连对主席说：“我马上回去，先把工作安排好，王维舟同志可以代理，然后来延安。”主席点头说：“好嘛，你来后，先找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给我印象很深刻，他给我的深切关怀，亲切教诲，巨大启迪终生难忘。

在延安学习

毛主席批准我上学，我真高兴。从延安回庆阳的路上，虽然连日从荆棘满地、野鸡横飞、荒无人迹的山地跋涉，但激动的心情依然无法抑制。我从来没有进过学堂门，一直盼望着能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小时候，因为家里太贫穷，活命都难，哪里有钱供我上学念书。我们兄弟6人，没有一个识字。我们家旁边就有学校，每天看着有钱人家子弟上学念书，心里羡慕极了。参加革命当红军后，征战连年，上学机会也不多。长征路上，朱德总司令找我谈话，要我重回红四军当军长，我当即对总司令提出要求：我把部队带出草地后，让我去“红大”学习吧。总司令同意了。可是，后来红军出草地进入甘南以后，战斗更加频繁，公务也很忙，没有办法抽出身来，但心里要求学习的愿望始终不减。所以现在主席亲自批准我上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回到庆阳，我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迅速将各项工作作了安排落实，将旅部日常工作委托给王维舟同志负责。然后在两个参谋

的帮助下，集中时间识字练字读书，为去延安学习作些准备。

在动身去延安前，我还特意到防区各处转了转，作了查看。到七七〇团，张才千陪我深入到各营连驻地，也看了前沿。国民党就在对面。几天后，我坐车到西安，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住了两天，又坐车北上延安。经过洛川时，遇到林伯渠同志，他也到延安，我们遂同行。这是第一次见到林老，林老不愧为宽厚慈祥的长者，听说我到延安学习，一再勉励我好好学习，多看些书，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真令人感动。到延安后，我们同住城内的中央招待处。

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一到延安，我就来到主席处。主席依然在伏案写作。见到我，他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开玩笑说，“来得快嘛。”我汇报了几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和现在陇东地区的工作安排。主席说好哇，表示满意。我又急切地问主席我去哪个学校？主席笑着说：“别急嘛！”并转过话题问我们路上情况，一行几个人，途中顺利不顺利，有人堵没有？我一一作了回答，说路上还平安。主席放心了。我还说，那500名干部也都安全到达了延安，没有人出问题，主席说，那好嘛。

我又问去哪个学校？主席说，去“抗大”吧。并提笔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抗大”二大队支部书记谢礼泉同志的。

主席实在太忙，我不忍心长时间打扰他，收起信遂向主席告别离去。

这时的“抗大”大部分学员已经毕业，第二大队是唯一剩下的，也离毕业时间不久。二大队学员都是师团级以上的老红军。我去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陈伯钧同志主讲。我和陈伯钧同志是在长征中认识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同在红四军中工作，我任军长，他任参谋长。红军改编时，他为三五九旅旅长，也曾负责在陕甘宁边区东面留守，不久前才到“抗大”教学的。在“抗大”学习，学员没有发讲义，主要靠记